

钩沉

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登临上犹营前书峰之巅,天辽地阔,四野苍茫。清风徐徐,我恍惚看见,在树林幽深处,客家子弟伏案苦读的身影,耳畔似乎响起从太傅书院传来的读书声……

书峰,古称书山,位于营前镇北面,海拔700多米,四旁绵延的小山簇拥,使其形如书匣。山半腰间的水岭庄有数户卢姓人家居住,屋前面有一口十多亩水塘。太傅书院在这里历经数百载时光,湮没于岁月长河,只剩文脉余韵绵延不绝,浸润一方水土。

一峰藏文脉 毓秀润营前

□钟秋梓



营前文峰塔和云水寺。钟秋梓 摄

太傅书院育文脉

在赣州,卢光稠是声名显赫的人物;于上犹营前,他也是绕不开的存在。

唐光启元年(885年)一月,卢光稠在南康县石溪都(今上犹县双溪乡卢阳村)起兵,当月占据虔州(今赣州),自任刺史,统治虔州达二十六年。后梁开平三年(909年),卢光稠臣属于后梁,后梁加封其为“舟汝王”(世称“卢王”)。

卢光稠起兵之前,于上犹西部开闢盆地屯兵操练。兵民于兵营前进行交易,久而成圩。因卢光稠被迫封为太傅,兵营被称太傅营,圩场也叫太傅圩。因圩位于兵营前面,民间习惯称圩为营前圩。曾经的“营溪”“村头里”之名渐渐被“营前”取代,并作为行政地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营前盆地在宋代称为“峒”。作家李伯勇考证认为,宋代营前“化内之民”(纳入官府正式统治的百姓)与“化外之民”(峒民)的争斗不时发生,甚至峒民比较固守,常与官府对抗。为教化峒民,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:“嘉定十三年(1220年)八月二十六日,江南西路提刑赵汝谔将南安县丞阁下部省废,却以俸给补助新创太傅、石龙两寨及太傅书院地基,并养士田段等税赋。”宋嘉定四年(1211年)上犹县改为南安县。宋淳祐十二年(1252年),南安军知军陆钊,见书山林壑幽美,请示朝廷,获朝廷御赐“太傅书院”匾额。明嘉靖《南安府志》卷十七《书院》记载:“太傅书院在县治西营前礼信乡牛田上里,去县城几百里。”(也就是今天水岩乡书峰一带)自宋嘉定至明清,太傅书院虽历经兴废,却绵延数百年之久。

太傅书院是上犹有史可考的第一座书院。营前地区以书峰为起点,文风日盛,数百年的文脉源远流长,氤氲营前的山山水水……

文峰塔上兴文风

明天启四年(1624年)的秋天,柳州八贤之一、时任上犹县令的龙文光逆水而上,来到秀美的营前,饱览山色风光。他站在营前盆地中央的珠岭山上,张望四野,但见白云飘飘,青山如黛,天地空蒙。他注意到东边山势低矮,不禁感叹东方山脉过于低隐,致使营前文风不振。为振兴文风、培植文明、障蔽水口,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,他游说营前陈、蔡等大姓人家,倡导集资,建文峰塔于东面山上。塔建成后,营前地区文风日渐昌盛。营前客家人为感怀龙文光的指点,也称文峰塔为龙公塔,将塔所在东山下的村庄叫作龙下村。塔建成后不久,随文峰塔数十米开外,又建一座文峰寺(现称云水寺)。“蔡、陈两姓捐租田一百石,十五石为奉祀卢公香火费,八十五石为蔡陈两姓庠生分年轮收,并上达进京诸费。”(清光绪版《上犹县志》)

文峰塔是赣南目前唯一一座由塔内螺旋式梯阶登塔的古塔。塔门上方镌“文峰

塔”,门两侧镶嵌“文藏妙义千秋盛;峰秀奇韵万古存”,表露古塔承载的文脉期许。塔身六面七层,高25米,塔顶装有铜铃,风吹铃动,音响如琴,清脆悦耳,传递纵横十里的营前盆地,成为营前八景之一“宝塔琴音”。塔内有螺旋而上的阶梯100级,每层三窟,于窟远眺,峰岭层叠,云雾萦绕,呈九曲蜿蜒的云水河泛着银光曲曲东去,书峰毓秀、举岭灵韵、城楼山色、乡野田畴、市井繁华……万千风光尽收眼底。

古塔与古寺相映,山水与人文相融。龙公塔与云水寺历风雨经雨400余年,仍然屹立东山上,岁岁年年守护着营前的文脉,让崇文重教的信念扎根乡土、代代传承。

西昌乡塾振文运

明末清初,福建、广东沿海战乱不断,民不聊生,大量客家人从闽粤迁入偏安一隅的赣南上犹西部营前地域,在这里扎根生存和发展。

筚路蓝缕的客家人,抱着家族谱牒来到这里,被称为“新客”。“新客”和先行迁入的朱、陈、蔡等“老客”,经过前期的争斗、排斥,至后来互相融入,和谐共存、共同发展。营前渐渐成为上犹西部政治经济中心。

不论“新客”还是“老客”,客家人骨子里都坚守着崇尚耕读传家的思想。面对着重文轻农越来越多的实际,发展教育成为客家人共同的心声。上犹西部五隘(即今营前镇和水岩、平富、五指峰、双溪等四乡,及寺下镇部分)民众,自发筹建西昌乡塾,乐捐功名众多,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捐资。

建设西昌乡塾不是一蹴而就,从倡议、筹资、设计、选址、建设……历经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单就选址和构建上,就体现了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客家人心中的良好愿景——

西昌乡塾选址坐北朝南,北面约5公里处是书峰,南面约5公里处是举岭,隐含“倚书中举”之意;东面是文峰塔,西面为笔架山,又形成“人文蔚起”之势。前面是云水河岸延伸地带,地势渐高,为三进院落呈现“步步高升”格局奠定基础。在布局上,进头门,过甬道,是宽敞院坪,坪中央由五彩卵石铺就葵花图案,蕴“中魁”之意,四角栽种金桂,含“蟾宫折桂”之愿。院坪两侧走廊连通东西廊四间教室,构建有序的教学空间。由院坪登五级青石阶为第二进“至圣殿”,殿堂供奉孔子牌位。再后为“乐善堂”,高悬匾额,安置十六块五腊邑庠生、例贡生、修职郎、登仕郎、太学生牌位。

清光绪元年(1875年),西昌乡塾建成,上犹人、清翰林李临渊欣然题写长联:“大材柱石,小试弦歌,慕平天成地之休,应溯鹤湖宗旨,鹿洞渊源,非止长才夸锦疋;雷雨蟠溪,风云傅野,裕富国安民之略,预知凤翔高骞,鳌头独占,还从少日忆青袍。”他在对联中巧妙地嵌入五隘(大雷、石溪、平富、洞头、疋袍)名称,又融汇鹤湖、鹿洞两大千年书院文脉,深切寄望乡塾承先贤治学之道,育家国栋梁之材,祝愿学子扶摇直上、鳌头独占,

不负韶华、不负乡梓。长联笔墨铿锵、意蕴悠长,成为西昌乡塾传世的文化印记。

云水河畔扬文明

西昌乡塾是营前客家教育的重要载体,同时也开启了现代办学的先声。

1912年,西昌乡塾(西昌乡学)改名营前务实高等小学堂。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营前小学,后来又改为营北小学、营前乡中心国民学校、上犹县第五区第一完全小学、上犹县立第五完全小学。1953年复名营前小学。之后,随着上犹江水电厂建设,营前圩搬迁,1956年学校整体迁入营前街红领中路35号办学,延续至今。

1912年,21岁的营前合河窑岗顶大钟屋的钟润皆从上海章水中学毕业回到家乡,他在族中乡贤支持下,在屋西侧择址建设浚灵小学。学校建有宽阔的操场,明亮的礼堂、教室、办公室,开设语文、算术、音乐、英语、体育、美术、礼仪、劳动等课程。学校建成后,除了满足钟氏本族子弟就读外,也以宽厚、包容的心态录取其他姓氏、外地农家子弟就读,崇义、遂川、桂东、大余等地的学生慕名前来求学。一时间,浚灵小学文风蔚起,书香萦绕。新中国成立后,浚灵小学改名,成为公办营前合河小学,接续深耕乡村教育,守护乡土文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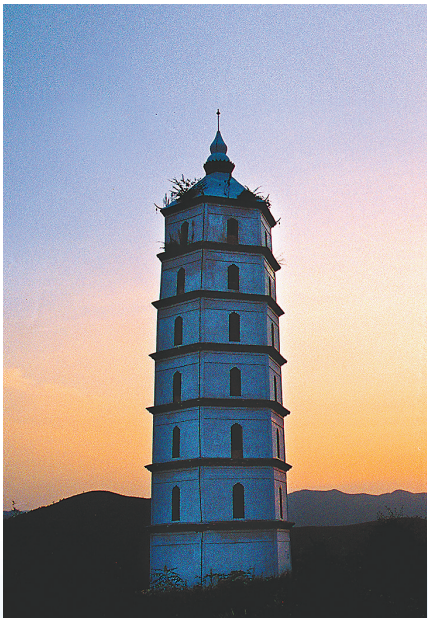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发展中等教育,1957年秋天,在西昌乡学(营前小学)旧址上创办营前初级中学。1970年增设普通高中,更名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中学。2002年经赣州市教育局批准,营前中学高中部改名为上犹县西昌高级中学。2011年8月,停办普通高中,至今保留初级中学,为上犹县规模最大的乡镇中学。学校创办以来,学校规模不断扩大,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,彰显了营前文教的深厚实力。

发源于罗霄山脉的云水长河,穿山越谷、奔流不息,曲曲东流,千年来滋养营前沃土,孕育出营前地区独树一帜的客家文脉。

客家人把“耕读传家、崇文重教”写进家谱,奉为家训,以“耕读”为正道,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。耕以固本、读以修身,诗书立世、礼义传家,成为这片土地不变的精神信仰。营前子弟从牙牙学语就开始背诵《营前八景》:

“营前书峰景致多,举岭献棋永不磨。浮潮夜月天上遂,蕉院渔唱几千歌。妙乐钟声数十里,龙公塔下琴音和。仙岩古松千万载,石人出在石溪河。”

昔日先贤启智兴学,今朝桃李满园芬芳。回望千年时光,在岁月更迭中,营前千年文脉依然清晰,如云水河,浩浩荡荡!而今,虽然太傅书院的读书声远去,文峰塔的倒影依然云水河的清波中荡漾,西昌乡塾深藏的崇文重教理念不断延伸和发展,在客家乡土上开枝散叶,生生不息。



营前文峰塔。李伏学 摄

远眺书峰。钟秋梓 摄

孔宗翰于北宋嘉祐元年至治平元年(1056年—1063年)间在虔州(今赣州)任职,其间主要政绩为修缮城墙、营建石楼,石楼就是后世所称八境台。任满之后,孔宗翰转赴他任,至北宋熙宁九年(1076年)接任苏轼所遗之密州知州一职。苏轼在此之前,与孔宗翰并无任何交游、酬唱或书信往来的记载,二人早年素不相识,并无交集。苏轼由密州改任徐州之时,并未在密州与孔宗翰会面交接,凡与密州相关政务及叙谈事宜,均在徐州一方完成。仅此一端,即可推知,苏轼与孔宗翰第一次相见,只能是在徐州,时间为熙宁十年(1077年)。

此次徐州相会,苏轼为孔宗翰赋诗多首,二人由此定交。以当时情理推之,孔宗翰既携虔州旧图随身,又与苏轼初识定交,乘便出示《虔州八境图》并恳请其为题咏,最为自然顺畅。因此,苏轼见到《八境图》,极有可能即在此次。至北宋元丰元年(1078年),孔宗翰改知陕州,苏轼在徐州将所作八首诗题正式交付孔宗翰。值得注意的是,苏轼见图与赋诗交付,前后相隔一年有余,并非当场见图、当场成诗、即刻题写,而是见图在先,允题在后,归而构思成篇,至次年方行交付。这一时间差,对判断诗与图的关系、题写位置以及画幅形制,都具有关键意义,不可轻易忽略。

《八境图》所绘内容,大致为六处楼台亭阁与两处山水景观。苏轼序中明言,图中不仅写定景,更兼摄寒暑、朝夕、雨晦、晦冥之变化,实景因时节、气象而移易,再加观者心境不同,景致观感亦随之万千,所谓八境,实则以八处取景为纲,而变化无穷,远不止于八。要表现这样一组多景点、多时段、多变化的景观,其画幅形制值得逐一细考。

若为单幅立轴,北宋间此类巨幅山水,固可在一幅之中容纳多处景物,形式上具备合一绘制的条件。但立轴之弊亦显而易见,其一,单幅静态画面,一图仅能取一时一景,与序中强调景致变化万千之意不相契合。其二,若作单幅全景,则慈云塔为全城制高点,视觉突出,必当入画,城池街衢、楼台烟树等城市整体格局亦应一并绘出,如此便成城市全景图。因此单幅立轴之说,虽形式上可行,却与图名、序意多有相悖之处。

若采用长卷,则可按空间顺序逐段铺展景物,如《辋川图》诸本,以真山真水逐段写实,用散点透视一路展开。但《八境图》与《辋川图》性质迥然有别,《辋川图》为连续空间、一路景致,宜于长卷;《八境图》则是自石楼上分头眺望所得之八个独立取景,各景之间并不连续,不成一路,属集锦式、多点取景结构。若强行纳入同一长卷,空间排布生硬辗转,故长卷之说亦不甚相宜。

较为切近情理者,当是一景一图,共八幅,自成一组。如此既可与八境之名一一对应,又能各自表现不同时节、不同朝暮、不同气象之景,与序文所述景致变化之旨更为契合。

此外,北宋后期绘画形制已渐有转变,由巨幅卷轴向便于携行展玩的册页发展,《宣和睿览册》的出现即明证。孔宗翰离虔之后,携图辗转各地已达十余年,大幅立轴与整扇屏风均不便长途携带、屡次迁徙,唯有小幅册页可束之行篋,携带便利,展现随意。故《八境图》极大可能为八幅独立成组之画,或为绢本屏风,或为纸本册页,虽未必已经装裱成册,但整体必为分景分幅、成套而存。

关于《八境图》的作者,苏轼序开篇即称,《南康八境图》为太守孔君所作,孔君既筑石城,即凭城楼所见而作此图。字面看似明确判定为孔宗翰亲笔所画,然细加考辨,则未可如此泥定。其一,孤证不立,孔宗翰一生,除此条记载外,不见其他任何画迹、善画之记载,亦无时人称其能画,仅据一“作”字便断其亲笔,证据单薄,难以坐实。其二,古人用字中,“作”与“画”义本有别,文中“君既作石城”,“作”乃主持营造、督率兴建之意,并非亲手垒石,同理,“作是图也”之“作”,完全可理解为主持规划、命工绘制,成此一套图,而非一定亲手执笔。其三,《八境图》以楼台亭阁、城池塔院为主,多需界画、工笔,讲究位置准确、比例合度,此类画法本是职业画工之专擅。况且,要完成一套体例整齐、楼阁分明、位置准确的《八境图》,由专业画工主笔,远较文人自运更为合理。其四,苏轼平生题画诗,凡知画家姓名者,多直书其人,并赞其笔墨气韵,断无讳而不言之理。今《八境图》诗但咏其景、叙其事,绝不言及画师、笔墨与画格,亦从侧面说明,苏轼所见之本并无明确画师名款。由此揣测,孔宗翰或为《八境图》之倡始主持者、所有者与署名者,而非实际执笔绘制者。

至于苏轼那八首诗究竟题于何处,苏轼序中虽有“乃作诗八章,题之图上”之语,但若细加推求,则实际更可能是另纸书写,而非直接题写于画面之上。其一,若为一幅画,只应题一首诗,不当云“作诗八章,题之图上”。既称八章,正与八境八幅相对应,若真题于图上,亦应是一图一题,然综合其他条件,此说亦难以成立。其二,北宋作画尚构图完整、画面洁净,题款多为穷款、小字、隐款,极少以长篇诗文侵占画面,破坏画境,苏轼深通画理,应少有伤画格之举。其三,苏轼传世题画诗,绝大多数另纸作诗、另行书赠,可考者多为诗画分存,并非诗画同幅。其四,孔宗翰作《八境图》在虔州任上,距徐州见苏轼尚有十余年,彼时绝不可能预知十余年后能得苏轼题诗,不可能预留大幅空白。其五,苏轼此序体制庄重、议论周详,实为一篇完整的《八境图》记说,如此长篇大论,更不可能挤题于画面空隙之中。因此,苏轼所谓“题之图上”,乃是广义上为此图而题、与图相配之意,并非真将诗文直接题写于画面之上,实际应为另纸缮写,诗与图相配而不同幅。

丹墨铸魂昭初心

——画家陈桂南笔下的《峥嵘岁月稠》

□郭祥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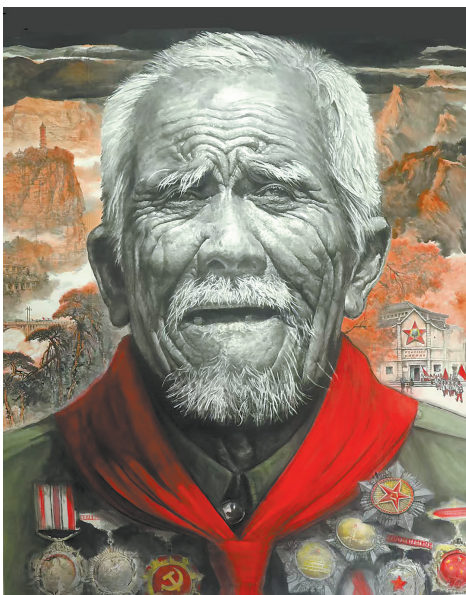


岁月 镌刻烽火,丹青礼赞赤诚。值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历史节点,回望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,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过往,已然熔铸为中华民族薪火永续的精神丰碑。赣南这片浸润红色血脉的热土,山河藏忠魂,文脉承初心,滚烫的革命记忆生生不息,为红色主题艺术创作孕育了取之不竭的精神滋养与创作源泉。

扎根赣南红土的画家陈桂南,深耕红色现实主义创作多年,对写实肖像承载时代记忆、传递信仰力量有着独到的艺术哲思。他坚守水墨为本,以精微写实为骨架,以人文精神为内核,恪守“以形写神、形神兼备”的东方美学要义,既追求造型严谨精微,又兼具时代叙事的思想厚度。245cm×200cm的巨幅水墨肖像《峥嵘岁月稠》,气势雄浑、刻画入微,兼具强烈视觉冲击与厚重精神意蕴,是立足赣南红土、书写革命史诗的倾力凝魂之作。

作品以中国式水墨肖像为载体,以长征老红军群体为精神原型,借具象入微的人物形象承载宏大历史叙事,立意高远,意蕴深厚。历经世纪沧桑,老人面庞纵横沟壑,是万里征途刻下的岁月风霜;皓白苍劲的须发,凝结着百年坚守的赤诚初心;胸前熠熠生辉的勋章,镌刻着铁血报国的滚烫荣光;须间一抹鲜亮红领巾,恰似永不熄灭的理想火种,灼灼跃动、生生不息。这既是时光的深邃刻痕,更是信仰的永恒烙印。画家以严谨造型与细腻明暗层次,雕琢时光肌理、勋章纹路与衣物质感,让个体生命与民族记忆深情交融。以一人之貌,塑一代之之魂,老兵形象升华为红军先辈的风骨缩影,完成从个体叙事到群体象征、再到时代气韵的层层升华。

为拓宽历史纵深、烘托时代气韵,画家在背景意象上匠心营构,以多重红色符号铺陈意境:中央苏区红色旧址播撒信仰火种,宝塔山照亮革命前路,黄土山河沉淀岁月厚重,苍劲青松挺立不屈风骨,映山红淬炼赤胆忠魂。长征精神的赓续传扬,蕴藏于笔墨之间,峥嵘岁月凝于丹青,革命风骨永驻山河。



《峥嵘岁月稠》

在笔墨与色彩表达上,陈桂南融传统写意笔墨与当代写实技法于一体,构建“笔墨为体、色彩为用、意象为核”的独特创作路径。他将国画皴擦点染的写意意趣,与西画明暗塑造的写实功力相融相契,以沉郁内敛的水墨灰调,塑造老兵历经烽火淬炼后的沉稳坚毅;以黑白为基底,令勋章鎏金、领巾赤红成为视觉焦点,让色彩化作理想信念的诗意隐喻。背景以赭石晕染苍茫山峦,丹红点缀烂漫杜鹃,实景物象与精神意象相生相融。笔墨刚柔并济、虚实相生,既写实传神,又尽显东方水墨的气韵神采。

从时代价值与创作立意审视,本作承载着深沉的文化赓续使命。在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时代语境下,亲历烽火的前辈渐次远去,红色基因的延续愈发依托艺术留存与视觉定格。陈桂南怀揣敬畏之心、饱含家国深情潜心创作,以巨幅水墨肖像的庄重形制,将老一辈革命者的奋斗品格、理想信念,凝定为可视可感、代代相传的艺术创作。作品根植传统笔墨文脉,契合当代审美范式,以沉稳真诚的艺术表达诠释红色主题,实现艺术性、观赏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。